

# 三国演义学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力 李 楠  
封面设计：邱云松 张复祥

391

### 三 国 演 义 学 刊 （ 二 ）

---

编辑者：《三国演义学刊》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发行者：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成都陆军学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2.5    字数： 313    千
1986年8月第1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书号：10316·41	定价： 2.50    元

---

1986年8月  
第2期

## 三国演义学刊（二）目录

---

### · 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 ·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与《三国演义》研究

- ..... 鲁德才（1）
- 《三国演义》研究和方法问题..... 何满子（12）
- 为什么《三国演义》的主题越争越多..... 杨凌芬（18）

### · 作者与版本源流 ·

- 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 刁云展（30）
- 《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 孟繁仁（38）
- 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 李灵年（54）

### · 主题与思想内容 ·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 论《三国志演义》的历史观..... 程 鹏（64）
- 《三国演义》反映的心理意识..... 杜景华（80）

## · 人物形象研究 ·

- 李、毛两本诸葛亮形象比较论…………… 黄 霖 (92)
- 决策：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  
——谈《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  
活动的描写…………… 欧阳健 (110)
- 论赵云…………… 沈伯俊 (124)
- 试论曹操性格的二重组合  
——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断想之一  
…………… 许建中 (140)
- 论孙权形象…………… 吴锦润 (151)
- 论周瑜和鲁肃…………… 陈周昌 (160)
-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陆逊形象…………… 于洪江 (173)
- 夹缝当中看东吴  
——评《三国演义》中孙吴集团的  
战略得失…………… 林 骅 (190)

## · 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

- 《三国演义》与“历史——传奇”体系…… 罗德荣 (198)
- 《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  
——兼论不宜机械搬用“历史真实与艺  
术真实的统一”…………… 熊 笃 (211)
- 《三国志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  
原因…………… 宋常立 (224)
- 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  
——从蜀魏街亭之战谈起…………… 常林炎 (237)
- 夷陵之战的情节和人物创造…………… 曹学伟 (254)

试析《三国演义》两个高峰的艺术效果

..... 张 力 李 楠 (264)

· “毛评”面面观 ·

毛宗岗小说美学的辩证观点..... 霍雨佳 (274)

毛宗岗的典型形象塑造论..... 陶 诚 (284)

毛宗岗论历史小说的特点..... 刘绍智 (296)

· 说长道短谈《三国》 ·

三国遗迹与《三国演义》..... 谭良嘯 (308)

《三国演义》的历法疏漏..... 任昭坤 (313)

· 世界文学中的《三国》 ·

历史战争的宏伟画卷

——《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的比较研究

..... 胡邦炜 (316)

《〈三国演义〉在国外》补遗..... 王丽娜编写 (327)

· 改编与再创作 ·

我说评话《三国》

——演出之余的杂感..... 唐耿良 (336)

可贵的探索，良好的开端

——评广播连续剧《辞曹归汉》..... 左 云 (349)

· 海外学者论《三国》 ·

《三国演义》及其作者... (苏)李福清著 姚宇珍译 (355)

《花关索传》校点记…………… 朱一玄 (368)

愿《学刊》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百科

全书…………… 孟昭连 (377)

《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三)…………… 孟杰整理 (383)

〔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

##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与《三国演义》研究

鲁德才

### (一)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改造了人类的认识结构，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浪潮又强烈地冲击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出现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主题学、读者反应美学、模糊文学等等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的传入，刺激人们的思维方式。文艺批评界似乎走在了前列，评论方法更新的探索成为批评家们的热门课题，并且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这种探索和尝试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方法更新本身，有人说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思维模式，移动固定的审视世界的观察点，改变习惯性的思路，并超越常规科学的限制。

面对批评方法的更新，古典文学研究，其中当然包括《三国演义》研究，是株守还是吸收，这是当前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认为无论是传统的小说分析，抑或新的批评方法，凡是有

助于推进《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方法，都可以提倡。传统的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新的批评方法也并非一无可取，天下没有独一无二、十全十美的研究方法。多维多向的视野，多种多样的方法，有利于打破思维惰性，使人们从单一的思想方法中摆脱出来。

传统的小说分析，例如对作者生卒年月、社会经历的考证，作品的年代真伪，版本的收集考订，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作者的哲学观念在作品中的明晰度等等，这些外在因素的研究，固然被西方批评派斥为非文学的批评，但是外延的研究在作品释义上的价值，谁也否定不了。因为社会经济、政治、自然环境和作家的经历，作者在创作时的某种心理状态的因素，对构织一部小说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三国演义》的非文学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刚刚起步，诸如罗贯中的生平思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源流等等，许多问题至今语焉不详，有待学者们深入探索，有许多话还要说下去。问题是我们应当突破以政治为本位的批评模式，拓展审视作品的角度，例如我们可否从文化史的角度，研讨《三国演义》所反应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呢？

所谓“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化的层次，它是相对“表层结构”而言。表层结构自然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常变动，深层结构，特别是文化潜意识，由于长期沉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因而表面层次的变动不能导致深层结构如西方式的进步与超越。深层结构中文化形态的核心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模式，尤以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



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

(1) 因此，周人的“忧患意识”，诸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互相兼并，灭国破家，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势，不能不启示思想家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哲学沉思，从哲学高度探究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这样，重人生、务实际、讲效用，就贯穿了整部中国思想史；对人的反思，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心态。

正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以人和人的义务为本位，所以很注重现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永远把眼睛盯着现实人生，并且总是倾向于从人生出发，从伦理出发，即便是道家讲究超脱现实，魏晋文学放浪形骸，最终归宿往往是充塞着生命灵魂的大自然，或是寄身于田园山林，而不是欧洲人沉迷于宗教、印度人追求涅槃，也因此，这种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重视与天道相协的人格。可是中国人又从来不脱离社会伦理关系，脱离发展他人的人格来评判人的价值，成就自己的人格。这样，个人的人格要通过转化社会来完成，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对国家负有责任，中国历史上无数忠勇报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刚正不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有志之士，不正是忧患国家和人民的同时，成就了内在人格，显示了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吗？

所以，经过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两个层面：封建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强有力地隐伏在古人的心理状态中，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 and 原则。《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毫不例外，当他再现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生活时，必然浸透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表现出整个民族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活动的特点。因此，通过群体形象所表露的与其说是刘姓天下非刘备莫属的正统思想，毋宁说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儒家正统思想。所以，若从儒学的立场来看，罗贯中塑造的刘备，其实是儒家“圣王”的典范。像中国古代一切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他力图把儒家的道德理想转化为政

治理想，实现道德化的政治。于是，刘备给予人们的感受好象是虽包藏宇宙之机和吞吐天地之志，但不必据天下为己有，只要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则何必一定由我呢？不过面对众豪杰争霸逐鹿，刘备非是甘居寂寞之辈，不同的是他沿着“仁义”的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让徐州，不因的卢妨主而设法祈禳，不苦留徐庶致使他母子分离，弃新野携民渡江，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处处表露了一个内圣外王的品格。也典型地反映了儒家“以德服人”的思想。被称颂为“一代完人”的孔明，最初隐居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经刘备再三催请，“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运筹决策，折冲樽俎，创造了鼎足之势。此后，欲进兵宛洛，复兴汉室，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同样是反映了中国人那种“由吾之身及人之身”，在人情的磁场中完成自我人格的深层意识。

笔者无意否定刘备和诸葛亮的典型价值，我只是说要把刘备、诸葛亮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所谓节操、忠烈、智勇要放在传统文化结构的框架上，比较广泛、比较深的反思基础上，既看到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也看到儒学的基本精神。倘如此，我们也就不必把曹操看作是奸恶的化身，因为曹操的思想不过是反映了传统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政治化的道德。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掌握政权的封建统治阶级遵奉的思想，同刘备推行的道德化的政治显然是对立的。我推想罗贯中在创作心理上，也许是用道德化的政治来反对政治化的道德，所以才强化了刘备和曹操的形象，概括的不只是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特征，而是容纳了他对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观察。然而，罗贯中又不能不尊重历史，企图把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的追求，毕竟是小说家言，现实的政治往往是极其残酷的，就连历史中的刘备也只据一州之地，并未能一统天下，全面实行圣王之治。于是作者描

写蜀国诸英雄的结局，不免有点悲剧意味，这大概是传统心理结构在小说创作上的反映。

## (二)

这种心理结构在文化意识上当然要影响中国小说家的典型观念。

有人说《三国演义》的典型是类型化的典型，原因是重要人物都以某种道德品质作为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比较稳定，保持着古典式的静穆，缺少纵的和横的发展变化。这些话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小说家们为何都以某种道德品质作为人物的基本特征呢？倘若说类型化的典型主要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生活简单，精神生活贫乏，封建专制制度和唯理性主义造成的，那么何以到近代小说仍然受理性观念的支配，乃至某些当代小说的创作也逃脱不掉咱们老祖宗的潜意识影响，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类型化的典型呢？倘若以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来绳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且不说这种流派分类是否合于中国国情，——只有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后，或是到了资本主义成熟时期，才能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人物，那么，为什么在封建社会同样能塑造出如鲁智深、李逵、林冲、武松、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性格化的人物？换言之，如果只承认《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才是正牌的性格化的典型，那么，《红楼梦》的作者何以有不同前辈的典型观念，为什么他的典型观念没有形成中国小说创作的整体的审美倾向？原因有种种，但我以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心理结构左右着作家，有迥然不同于西方人的典型观念。这如同有的学者以《三国演义》与《海狼》作比较，不探求各民族相同和相异的文化思想，那是比

不清楚的。

中国人以人为中心的致思倾向，不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不同于西方探求物体本源和结构，讨论知识来源的倾向，而且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和自然对人事的意义，强调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熔在道德论之中，直接从社会人事的现实需要来把握世界。可见，人在中国思维传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中国人的义务本位的观念又把入界定在各个本位之内，君臣父子都在特定的规矩和范围内尽自己的义务，不准有任何逾越。所以，本质地说，传统的文化心理又造成了自我的弱化，自我性格的压缩，个人不能越出本位而独立发展。这种以价值判断、寓事实认识的思维方式，被儒家运用到文学艺术上，形成了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占据了思想权威的统治地位。所以，作家们的审美意识与封建伦理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审美情趣里沉积着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传统的义务本位精神强烈影响作家的审美情感，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小说家在创造每个典型人物时，都要经过理性主义染色板的调制，美与丑、善与恶都要非常明确和确定，以强烈的理智形态呈现出来，往往强调那些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伦常观念，描写那些最能培养高尚情操的东西。于是小说家歌颂忠勇报国的杨家将、岳飞，马革裹尸、为国捐躯的宗泽、史可法，不畏权贵、爱民如子的包拯、况钟、海瑞，反对暴君独夫的周文武王、姜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深明忠义的关羽、张飞、赵云……；与此同时，古代小说家们也塑造了殷纣王、董卓、秦桧、张邦昌等等昏庸失德、荒淫无耻、奸妄凶残的反面人物，既奸又雄的曹操。这与西方小说家们的典型观念就有不同。

西方从文艺复兴把“人”解放出来，到近代的存在主义就特别突出个体灵魂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内在因素的造物，强调个人在身体上与个性上的美感，重视个体有无完整性，能否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作自我的完成。杜

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个大学生杀了对社会有害的老妇，主人公不向法律和宗教这西方两大权威认罪；结果是妓女的爱情拯救了他，使他在公众面前承认了杀人。那么，行动的准则在爱情，是在人自己，非中国式的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的重社会伦理价值。直到近世的存在主义，自我疆界的观念更为明确，他们主张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基地，他的存在才开始存在。所以，西方的罪恶文化必然要描写个体的灵与肉的激烈冲突；灵与肉的分裂也必然形成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不同的典型观念。

所以，我以为中国古代小说家们并不缺乏艺术创造能力，写不出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事实是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写了诸葛亮神机妙算，腹谏韬略，奇计用兵，善于识人用人，也写了他误用马谡，招致街亭失守，进军中原的溃败。诸葛亮虽然执法严明，坚持原则，但不得不照顾刘备的关系，搞点妥协，让关羽接续镇守荆州的重任，结果被陆逊、吕蒙利用关羽孤傲的弱点，乘隙而入，夺取了荆州。曹操虽冷酷无情，却有着感人的诗人气质；能宽恕替袁绍起草檄文，大骂曹操以至曹氏祖宗的陈琳，却不能容忍猜透他心思的杨修，性格并不只是一个层面。

问题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的审美情趣，特别是在义务本位的传统观念制约下，小说家们特别重视美与善的显现：为了强调某一方面的审美理想和伦理观念，往往较多地突出某方面的性格特征，赋予人物以明确的是非善恶形态，抑制了人物独立性格的其他侧面的表现。即使是描写了性格的多样性，也还是一种平面的并列结构，不象西方小说和当代小说的性格构成，属于性格的两极性交叉融合，肯定与否定的二元对立，——由于人物性格内的两极相互撞击冲突，推动了人物性格的发展。相反，古典小说中次要性格与主要性格在量与质的比值。

上并非对等，只是衬托、深化主要性格，形成多谱色。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对陈琳等人的宽恕，对杨修的嫉恨，同样是为了刻划曹操奸诈的主要性格。如果说性格上出现矛盾冲突的话，那也多半是外向的，性格与性格之间的冲突，所谓忠与奸、善与恶的矛盾对立，而不是一个人物性格的自身内的正反两极的斗争。可见，在典型构成上要求有明确的是非善恶的伦理规范，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宗法式社会体制和相应的儒家思想观念，对艺术典型的具体形式起了决定作用，决定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因而，人物典型必然以模式化的形态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 (三)

这也说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而这种意识也影响历史演义小说的特别发展。由于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变幻浮沉，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小说家，成为讲史小说家最爱处理的题材。无论是描写开国题材的小说，消除内患、巩固政权的小说，还是反抗外族入侵、忧患国家存亡的小说，都强调突出具有普遍政治意义的性格特征，人物按照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排列组合，形成对立营垒。倘若是正面角色，往往是誓死效忠的精神象征，具有超人的勇猛，史诗形态的道德情操，对坏人宽大为怀，忠于自己的情感和道德上的约束。但是，另一方面，小说里的反面人物通常被写成狡猾、阴险、玩弄权术，而又掌握实际权力，跟宦官及其他有势力的朝臣勾结，又与下层贪官污吏结党营私，形成派系，左右不明真相的昏君。这样一来，忠臣义士一开始出场便投入艰巨的斗争：要不断战胜空间和时间内的和自然界的种种威胁因素，始终保持着紧张和痛苦的状态。而且这种内心的紧迫感使他左右为难：因为历史的使命感和民族情感，使人物产生战胜困难的决心，不愿妥协；但是英雄人物往往遭到陷害，不能实现他们

的主张，最终落下悲剧命运。也正是在这忠与奸、善与恶的对比中，小说家才将人物行动具象化，并赋予伦理观念以深度，完成讲史小说历史教育的目的。所以，历史演义小说构成典型的方法，虽然受主题性质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是由于中国的讲史小说家取材于历史而又不都忠实于历史，大多把历史事实与虚构结合起来进行再创造，或者说对历史加以小说化的描写，目的是让人们作历史的反思而不是传播历史知识。因此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不等同于历史人物，而是某种精神道德的典范，带有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性历史人物”的特点，表现了中国民族的精神和特性。读者也很少像历史学家那样追究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他们感兴趣的具有民族意义的人物的命运，历史的教训和处理诸种矛盾关系的艺术。由此，历史小说家在刻划人物时，采取抽象和样板式的写法，强化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这几乎是历史演义小说家们惯用的写法。

从这一点来看，罗贯中尽管遵循历史真实，又不拘泥历史，塑造了诸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吕布等等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个性化人物；但是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和讲史小说的形式又限制了他着力于个性的深化：为了历史而压迫人物，为了故事情节而淡化了人物的性格。这也是传统心理结构在文化上起着作用，就是说，它“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神秘的情感迷狂和心灵净化”〔2〕。

#### （四）

美国密执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林顺夫先生，在《〈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体结构》和《中国最后一部古典小说——论〈老残》

《〈西游记〉的境界和结构》中，不赞成用西方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说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小说，忽视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特性。他认为叙事结构不仅仅是创作的一种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人们审视生活与世界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说来，中国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种种特殊性，是与中国特殊的世界观有关。斯坦福大学亚洲系副教授王京玉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3〕，他从中国思想文化这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里的人生观念及其思想矛盾。西方人的认识我们不一定都能接受，他们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某些见解却是可取的。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教授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拿中国人的独特思想和宇宙观来解说一切，那么中国小说的大小弱点，都可一一化为优点了”〔4〕。用中国人的宇宙观企图把古代小说的弱点化为优点的研究方法，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是，研究中国人的心态与小说艺术的关系，从而探寻形成中国小说独特表现形态的文化原因，未必是多余的工作，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不但见之于历代小说，也表现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例如中国人的本体论的模式就是阴阳在太极中的相互协调与渗透，天地万物的生息，四时阴阳的变化，都处于一种各安其位而又互相制约的统一体中。日夜交替，春秋代序，物极必反，永远是个循环的系统。《三国演义》开篇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一种循环论观点。东汉王室衰微，诸雄蜂起，由合而分；魏蜀吴三国鼎立，再由分而小合，最后统一于晋。统一于晋是否不再分了呢？按照循环论的观点，“合久必分”，晋朝迟早也要被新朝取代，胜利者不是西晋而是历史。

所以，从时间来说，《三国演义》基本上沿循历史发展顺序，描写了各个阶级的争霸内容，尽管人物活动时间的长度与情节的长度不相等，时间跨度很大，线性的序列的思想却是很明确的。然而，小说写了几百个人物，有头面的英雄几十位，特别是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刘备、孙权自成系统，赤壁之战之后又三足鼎立，各国之事及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不能不写，于是作者又向不同生活侧面和空间领域延伸，形成一个并行的但又是交错的情节发展，提供给读者一幅全景式的画面，奠定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结构模式。这种非线性的序列的思想，横向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的组成，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匀称和平衡的构思的整一性，除了史传文学的影响、讲史小说的审美要求而外，是否和中国人的思维系统有关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

**注：**

- (1) 高尔太《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 (2) 李泽厚：《美的历程》。
- (3) 见《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循环人生观及其意义》，《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
- (4) 《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香港《明报》1983年第8期。